

目 录

南海县旅港的杰出人物——何启	杜国彪 (1)
江孔殷纪事	梁世顿 (12)
康门弟子曹氏三兄弟轶事	谢应湘 (20)
岭南名画家傅日东先生	傅云若 (23)
附：傅日东先生遗作	
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广东美术界	傅日东 (28)
国民党中将邓刚二三事	李霜筠、邓一平 (31)
回忆民国时期叠滘的第一个飞行员杨永禄	陈遇安 (34)
前南海中学校长曾镜涵	关 祥 (35)
南海县第一任督学局长卢公辅	何青山 (38)
解放前任期最长的南师校长莫贤冠	朱哲夫 (39)
精研地理学的南海师范校长曹国权	黄家锐 (42)
南海县籍南社社友钩沉录	陈华新 (45)
南海人在粤北连州	胡祖贤 (50)
南海捕属的由来	梁松生 (64)
关于南海县解放后区一级政权建置的考证	马伯贤 (66)

解放初南海县一区恢复小学教育工作的回忆

.....谭 标 (86)

南海学宫.....采 苹 (93)

解放前的叠滘.....陈遇安 (95)

朱九江先生祠碑记.....门人南海何炳堃撰 (99)

南海里水镇名考.....李霜筠 (101)

里水的金丝虾.....李霜筠 (102)

大沥镇大镇村昔日八景.....黄家锐 (103)

石门反照考.....李霜筠 (105)

南海县旅港的杰出人物——何启

杜国彪

何启是南海县旅港的一位杰出人物。至今，在香港提起启德机场的创办，香港大学的建立，雅丽氏医院的由来，中英文的并用和重视中文教育，人们都会联想到何启。在七十多年之前，何启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对香港的文化、社会有过重大的贡献。他的政治主张对国内有过不少影响。

何启原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南沙村（该村曾属海州乡管辖）。何族在南沙村落籍有悠久的历史，到何启已是第十九世代的子孙。祖父何荣昌、字碧中，因生活所迫，出洋谋生，移居南洋马六甲，在摩利臣牧师开设的印刷厂当工人。这家印刷厂曾经出版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报刊，名叫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”，用木刻华文方块字印刷。

何荣昌生有二子：长子润养，字福堂，号进喜。次子润祥，字满堂、号庆云。何福堂是何启的父亲，年少时在摩利臣牧师设立于马六甲的一间中英文学校读书，毕业后继续往印度的一间教会学院深造。二十一岁加入基督教接受洗礼，后来为传教士，牧师。

1843年，马六甲那间中英文学校决定迁到香港，基督教会派何福堂与另一名外籍传教士赴香港主持校务。这间学校

就是香港英华书院的前身。

何福堂不但在香港为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当牧师传教，且为人长袖善舞，善于交际，善于观察经济情况，长于钻营。当香港开埠初期，地产价值很贱，他看准时机，从1846年开始投资地产买卖。初期仅以150元代价，在中环商业区购买了一幅地皮，后来地产升值获了巨利。1862年，他以26,325元的巨额投资购买了下一幅社团地皮，大搞地产买卖。因此，何福堂在香港期间，财富不断增大，能够用巨款供给儿子、女婿出洋求学。1871年何福堂病逝时，遗下资产达港币100万元（当年的港币100万元，超过今天在香港100亿元的地产购买力）。因他生前常怀念故土，死后葬于南海县西樵山石头岗（又名饭盖岗）西向。妻子黎氏亦葬在西樵山百鸟归巢的半山腰上。

何福堂生有七子六女（早殇者不算为五子六女）。七子是神赐、神添、神光（早殇），神保、神启、神宁（早殇）、神祐。第四子神启便是何启，年长时省去了神字辈称。何启字迪之，号淡生，生于1859年3月21日。年幼即勤奋好学，跟英籍私人教师攻读。当时学龄儿童入学，按照香港政府规定，须先读私塾数年，然后考入官立中央书院（1894年改名为皇仁书院，1885年孙中山曾入读该校）读第八班，何启由于英文基础甚好，数学成绩优良，1870年考入中央书院时竟跳四级进了第四班。那时代，香港中央英文书院的学制分为八班：由第八班读起，到第二班毕业，第一班为大学预科。与今天香港的学制比较：第八班相当于今天英文小学的五年级，第六班相当于初中一年级，第四班相当于初中三年级，第二班相当于高中三年级。何启考入第四班时年仅12

岁，修业了一年，于1871年九月赴英国留学。先在根德郡的巴卢麻学校（Palmer Idouse school）继续攻读，1875年预科毕业，考入鸭巴甸大学（Aberdeen urinersity）攻读医科，这是英国的名牌大学之一。何启的学业成绩超群，攻读了三年，考获医科学士学位，再攻读了第四年取得外科硕士衔。年轻的何启，取得两个学位后，离开了鸭巴甸大学。

其时，学业超卓，风度翩翩的何启，结识了一位英国贵族华尔登的女儿雅丽氏·韦甘比（Alica Walkden），彼此相爱。在雅丽氏的鼓励下，已有医生资格的何启再读法律，以为将来从政的准备。遂于1879年进入英国林肯法律学院（Lincdais Inatitate）深造。1881年复得到高级法律学士的学位，取得大律师资格。毕业后，在伦敦与雅丽氏小姐结婚。当时华人与外国女子结婚甚为罕见，何启在这方面打破了传统习俗。婚后，不久即同返香港。这时，何启的年龄不过23岁而已。

当年的港督轩尼诗见他学成归来，在立法局致词，当众夸奖他的学业成就，称赞他为香港华人的精英。因此，何启刚抵港便立即当上第二个华人太平绅士，（第一位为伍叙大律师即后来的伍廷芳博士）。

何启返港后，开始是从事医生业务，挂牌行医，为香港第一名华人执业医生。但当时群众的医学常识很落后，对西医的愚昧未除，有病只找中医，甚至求神问卜，完全不信任西医，他的医务所几乎没有病人过问。因此，他的医务所无法再干下去，很快就歇业，改行从事律师业务及政务，成为香港第二名华人大律师。

1886年，何启被香港政府任命为洁净局绅，稍后被选为

保良局绅及团防局绅。从1890年起任香港政府立法局议员至1914年止，长达24年，成为香港历史上的第三名立法局华人议员。1896年，何启还奉委为东华医院调查委员会委员。

何启不仅是医生、律师与政界名人，而且是一个闻名的企业家、慈善家。他对香港有过很多重大的贡献。首先就是创办雅丽氏医院（Alice Medical Hospital），香港西医书院（College medicine for Chinese, Hong Kong），和兴建香港大学。

雅丽氏医院是何启为纪念亡妻创办的。他与雅丽氏结婚后感情甚笃。不久，生下一个女婴，送返英国由外祖母抚养，不幸夭折了。雅丽氏伤心过度，忆女成疾，于1884年6月8日病逝，留下了一笔为数不菲的遗产。他们结婚前后不满三年，深爱妻子的何启既不想承袭她的遗产，又深深感到有完善设备的医院的重要。为了纪念妻子，造福人民，于是有雅丽氏医院的创办。何启在创办时，提及当年香港的医院只有两种，一为政府医院，作风太洋化，华人不易接受。一为慈善性质的东华医院，管理及设备未达西方医院水平。雅丽氏医院的创设，就是要给华人提供现代化的医疗服务。

建立一间现代化的医院，所需费用浩大，不是雅丽氏的遗产所能应付。何启与香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教友商议筹款，结果美满。遂于荷李活道75～81号购地一幅，代价2万元由他本人捐出，伦敦传道会拨款14,000元建筑楼宇，底理罗士先生捐助5,000元购置医院设备。1887年二月十七日医院落成，即以雅丽氏为医院命名。中化称雅丽氏医院，英文称 Alice and Affiliate medicine，又称： Alice Memorial Hospital。初期有病床80张，后来增加到90

张。经常费用由香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及各方捐赠维持。医院开办后，由于设备完善，院内医生的技术水平高，因此为中外人士所重视。

雅丽氏医院后来与何妙龄医院及那打素医院合并，改称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。何妙龄医院是何启的大姐何妙龄，在丈夫伍廷芳于1922年在广州病逝后，将丈夫的一部份遗产建成何妙龄医院。那打素医院原来是1893年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在太平山街创办的一间诊所，后来由戴维斯医生（Dr. Davis）出钱以纪念其母亲那打素（Methersole），增设了三十五张病床，改名那打素医院。三间医院合并迁建于般含道。何启连任医院财务委员会主席达二十七年之久。早期的何妙龄医院是产科医院，那打素医院只诊妇女及儿童。三间医院合并起来的“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”发展成为一家完整的内外全科医院。但由于传统的影响，医院仍以妇儿科最为著名，产科尤为市民群众所称道。

在雅丽氏医院接近落成的时候，何启就和香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中人，一群医学界的朋友、以及香港政府多方商议，以雅丽氏医院为学生的实习场所，筹组香港西医书院。当时，热爱祖国的何启认为要拯救中国，一方面要发展医疗事业，以维持国人的身体健康；另一方面必须设立科学和医疗技术结合的大学，以促进中国青年对新医学术的认识。且鉴于当年西方医术虽逐渐为华人重视，但香港仍无训练培养医生的学校，有志学医青年必须留学英国，成立医学院便成为急不容缓之举。经过多方商议的结果，学院定名为：“香港西医书院”（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, Hong Kong）。其所以称为书院，是当时新学初兴，制度未立，

国内的学校均以书院为名，于是仿照而定。推荐史越活博士（Dr Stewart）为院长。香港西医书院的程度，与大学医学院相等，为五年制的医科学校。每年学生交学费10元，中学毕业即可申请入学。

雅丽氏医院全部落成时，香港西医书院亦同时成立。盖生医生（Dr. P. Manson）和康德黎博士（Dr. Ganse Cantlie）先后任教务长，主持院务。何启以书院创办人，名誉赞助人，自任为义务秘书。院内各科教授均为专门的学者和医生，何启也曾兼任外科及法医学与生理学教授。首批入学青年有孙中山等12人，孙中山在1888年秋季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学院，后闻何启创办香港西医书院，遂于1887年转学入院，攻读五年。在何启任教期间，孙中山不仅学得医学理论，同时深受何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，提倡新政，改革旧弊的思想影响。1892年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，孙中山以优异成绩，获第一名毕业，同届毕业的还有江英华，仅得二人毕业。同期同学成绩未达要求的，继续学习，延迟一年甚至三年毕业。因此有的学生攻读时间长达八年。香港西医书院创办二十九年，但招收学生并不多，仅得128人，而及格毕业者只有四十一人。

1905年，何启发起扩建香港西医书院校舍，向政府申请拨地，同时获得好友吴理卿捐赠五万元。1908年，扩建计划将实施时，社会人士发起创办香港大学，并提议将香港西医书院纳入香港大学之内。经过协商，何启代表香港西医书院于1912年签字同意合并。其时，香港大学已于1911年开学，香港西医书院则于1923年成为香港大学的医学院。由于医学院校舍尚未建成，仍在香港西医书院上课，直至1916年始迁

入新址。

提起香港大学创办的经过，不能不谈到何启的创立圣士提反中学。盖由香港开埠以后，即由英国管辖，一切政务推行及商务往来均以英文为主。英港政府为了训练实际所需的文员、和较大商行的秘书，于是设立了中央书院和各官立小学，但这些学校均以英文讲授为主。何启有见及此，深深感到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便和曹允善律师及殷商周少岐等，倡建一所中英文并重的圣士提反男中学，上午讲授英文，下午讲授中文，得以保留中国的学术文化，使学生们不致忘本。经过多年的筹备，该校终于在1903年正式成立。

1908年一月，圣士提反男中学举行毕业典礼，何启特邀港督芦押爵士（Sir. F. Lugard）莅临致词。芦押爵士在致词中指出：西医书院为大学水平的医科，理宜设立于大学之内。而且香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，实有设立一间完全大学的必要，希望社会人士大力捐助，俾能尽快完成。当时殷商么地（Mody）听了港督致词后，首先响应，立即自愿捐款15万元作大学的建筑费用，还捐款3万元为大学的经常费用。芦押认为何启最热心教育事业，请他邀约港内的有关人士为募捐董事。1909年2月15日在香港总督府内举行了第一次筹办香港大学募捐董事会议，何启被推选为募捐董事会主席，商讨了募捐筹款事宜。在何启与各董事的努力募捐下，1910年3月已收到捐助款项达港币692900元，香港大学得以动工兴建，于1911年正式成立。港大第一年所招收的学生54名，其中圣士提反男中学毕业的占三份之一。何启对香港的教育事业是作出了不少贡献的。

鉴于何启对香港所作出的贡献，1910年英廷特给何启颁

予爵士勋位。

何启除了公职之外，还做私人生意，他又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。晚年与友人区德合作，组织启德地产实业公司，大力投资地产。区德本来就是一个大地产商，他们合作后向九龙湾大搞开发。当年香港卖地不是先填海后出售，而是指定海床出售，填海由买家自理。启德公司向政府投得九龙湾海床，自行填海建屋。填海规模颇为庞大，加上当年汽车尚未开始使用，交通非常跋涉，更谈不上机械化施工，因此，填海工程很艰巨。填海以后原为建房，但当年香港人口不过二十余万人，对房屋的需求不像现在那样迫切。后来，启德公司几经艰辛填出来的一部份土地，租借与新成立的香港飞行会作飞机升降之用，而这块地就发展成为今天的启德机场。

初期机场面积不大，日军占领时为了便于飞机升降，将邻近机场的当年启德公司填海建成的启德一路、启德二路、启德三路，打古岭道，全部改建扩大机场。以后，香港政府不断经营，启德机场现已成为香港的国际机场。每年出入境飞机旅客达1,000万人次，客运量列世界国际机场的第七位。每年货运达40万公吨。一九八四年处理货运大厦后，增至70万公吨。一九八八年建成新的客运大厦，客运量每年增至1,800万人次。这个机场与32间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来往香港及东南亚、中东，北美洲、欧洲、非洲、澳大利亚等七十五个地方的定期班机服务，唯一最缺乏的是直接飞往南美洲的机场服务。

航空业的发展，促进香港工商业的大发展，工商业的大发展使香港成为东南亚的贸易港。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航空业迅速发展。香港人看着今天航空业的发展，自然缅怀当

年何启、区德所打下的基础。

以上所述是何启对香港作出的贡献。至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，对国内也产生过不少影响。

何启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，他接触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，深感清朝政治腐败，必须大加改革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，提倡新政。1872年即与王韬等人创办《华字日报》，次年又与王韬黄胜等人创办《循环日报》，向人们报导世界上的大事。从1887年（光绪十三年）到1900年，和胡礼垣先后发表不少政治论文（胡礼垣又名翼南，著有翼南全集），编为《新政真诠》出版。所论均为有关政治革新，救国救民的主张。所作文章均以英文发表，由胡礼垣译为中文。1887年（光绪十三年），曾纪泽著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何启恐其误国，发表“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”，给予批驳。其重要论述有：《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》、《劝学篇书后》、《呈请代奏变化自强，当求本原大计条陈三策疏》、《中国之评论》、《睡与醒》、《新政真诠》、《中国改革之进步论》、《革命新编》、《康有为君政见之评论》、《新政安衡》、《新政论议》、《与英国巴公爵讨论门户开放》等。

何启和孙中山是师生，孙中山在香港医西书院求学时，思想上受过他的影响。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，获得何启的支持。而且，何启还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

1895年8月，孙中山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召开会议，商讨广州起义方略；何启与德臣西报记者英国人黎德亦出席参加。何启被公推主持会议，任革命军发言人。并负责与黎德起草英文对外宣言，待起义成功，即分送各国，要求承认

义军为交战团体。这就是乙未年广州之役，后因事泄，起义失败。

1899年，与区凤墀等人协助陈少白在香港创刊《中国日报》鼓吹革命。

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时，帝国主义者纷纷入侵，瓜分中国的祸害，迫在眉睫。当时李鸿章总督两广，何启草拟《平治章程》，主张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，由李宣告两广独立。由孙中山率兴中会会员助之、推行新政。孙中山对此，复电赞成。何启即与香港总督卜力爵士面谈，卜力极表赞同，答允代向李鸿章接洽，李鸿章初表好感，后何启与姐夫伍廷芳北上往见李鸿章时，因北京陷落后，两宫太后无恙，李鸿章被调赴京，此议遂罢。

1911年十一月武昌起义成功，孙中山念及恩师何启，有意重用。先邀请他返粤，任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的总顾问。孙中山特别嘱咐胡汉民，凡外交事务请教何启。何启返广州后，第一次向胡汉民献策：将广东省的税收款项存入汇丰银行，以策万全。胡汉民拒绝接纳。何启感觉没趣，同时对国内当年官场的人浮于事，也看不顺眼，最后，他离开广州，重返香港去了。

1914年2月，何启因健康不佳，辞去香港政府的立法局议员职务。同年7月21日在香港般舍道45号B寓所病逝，遗体葬于跑马地坟场，与英籍妻子雅丽氏的坟墓为邻。

何启的第二任妻子黎玉卿，为美国富有华侨之女。生下十子七女。十子是：永贞、永乾、永亨、永元、永利、永安、永康、永感、永德、永谢。黎玉卿生于1870年，死于1945年。亦葬于跑马地坟场丈夫的墓旁。

关于何启一些亲属的情况：大姐何妙龄嫁与伍廷芳为妻，伍廷芳曾任李鸿章秘书，驻美国公使，驻西班牙公使，财政及商务委员会副主席。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时，伍廷芳担任财政部长，外交部长，司法部长。孙中山避难于中山舰时，伍廷芳亦陪同上舰，随即病逝。何启的长女嫁给伍廷芳之子伍朝枢博士。伍朝枢曾在香港执业大律师，其后任国民政府外交官，当过驻华盛顿大使。何启的另一个女儿嫁给傅秉常，也是一位外交家。何启的长子何永贞，官名何君干，在伍廷芳任外交部长时，他任次长，与伍廷芳一起陪同孙中山上中山舰。后来曾任粤汉铁路局长。至于何启的孙儿们，现大多数在美国。其中突出的：何鸿威是美国华人地产财团之一。如鸿飞则在美国营商。何鸿铸当海员，改名何雄，是世界十大船长之一。在香港的何鸿钲，原来也是远航轮船船长。在国内的只有二人：何鸿铎，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，后任佛山市卫生局副局长。何鸿星，现在上海，是电镀专家。我们相信：何启的后代们，将会继承先人遗志，积极为人类造福；热爱祖国，关心祖国的富强，为祖国的兴盛尽力的。

〔江〕〔孔〕〔殷〕〔纪〕〔事〕

梁世顿

江孔殷祖籍广东南海县下塱乡（现即张槎下塱）。生于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恩科中二甲第二十七名进士，时年四十岁，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批的进士，江擅长书法，中进士后选入翰林院，授职庶吉士。因年考成绩优异，升任编修。光绪三十三年，钦放广东道台。

“叩谢龙恩”时，江孔殷入宫拜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当面赏江孔殷兰花一百二十盆。因而，后来江孔殷在广州河南同德里营建“江太史第”时，别称“江兰斋”。

江孔殷年幼丧父，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赖两个母亲抚育成人。他秉性聪颖，课读过目成诵。少年时应童子试，青年应乡试，考取秀才和举人。未中进士前，已因功名成为乡绅，经济生活已摆脱困境。后来，他衣锦还乡，修祠堂，敬乡亲，清源修寨，抚恤贫苦，甚得人缘。他和清远县的朱汝珍，为光绪甲辰科同榜进士，两人都是当时广东有名的书法家和才子。

江孔殷曾一度奉命到过日本、台湾和朝鲜进行考察。考察的结果，认为中国不能当亡国奴，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。返粤后，主张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在当时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保皇派。他在广东任两广清乡督办四年，干的主要是办团练和剿匪工作，把地方上的地主武装力量统辖起来，对付各地的土匪势力。对土匪，他主要采用招安办法，给大小土匪首领授以官职，换取地方表面上的宁静。至清帝逊位，他就同时被解除官职了。

江孔殷是个历史的人物，经过清王朝、国民党时期，日本沦陷时期和解放四个时期。江孔殷，一个清末遗老，他的一生，有功有过；他的为人，有褒有贬。这里记下的，是有关他的几段鲜为人知的史实。

二

1911年3月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起义，是惊天动地的，当时在进攻督署时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是受万人敬仰的。民国十年，孙中山先生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题碑就是“浩气长存”四个大字。他并在《黄花岗烈士事略序》一文中，描绘了当年起义之壮举“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……。”人所共知的收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骸的叫潘达微。潘达微是广东早期鼓吹革命的报人，早年参加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者。距今七十六年前（1911年）3月29日广州起义后，腥风血雨，他冒死收殓了七十二烈士遗骸，葬于黄花岗。这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。

但是，少为人知的是：当时协助他能够完成这件事的是江孔殷。有了江孔殷的协助，潘达微最后才实现了殓骸的壮举。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陵园里，有一座“潘达微先生之墓”，墓后石碑，刻有一篇辛酉年写的《潘达微自述》记载：“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吾党举义于广州攻督署不克七十二烈士殉焉”，当时“烈士遗骸”“折臂断脰血肉模糊目不忍睹”，余相机复以由某择地殓葬之意请诸各善董，各善董有难色，盖怵于咸恐事泄株累也，余不得已遂以电话达此意于江孔殷太史，求太史一助力，太史遂转电告善董，谓此事可历任，纵有不测彼可负全责，各善董得太史电乃允余请”。于是，潘达微雇件工于四月四日，自上午十一时起至下午四时，殓毕于黄花岗，后并把此事颠末披露于报上，标题为：“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”以志先烈。

又据《潘达微殓葬七十二烈士经过》（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81年7月的第61页）载：广州起义之役失败后，满城血雨腥风，行人管殆，烈士遗骸，更无人敢于收殓，以免官府追究，连累自身。党人潘达微，尽管尽力向当时的善董（慈善堂董事们）慷慨陈词，均不得允诺殓葬。“潘不得已，用电话与河南巨绅江孔殷联系，说明理由，请求协助。江……与潘属世交，……故特与两广总督张凤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有交往，乃慨然允诺，并电告各善董，证明此事他本人可负全责。于是潘得善堂允许，即着手寻觅坟地。”再据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》中《潘达微生平传略》载：潘“又向清乡督办江孔殷请求协助。江与潘是世交，而且与两广总督张鸣（一为“凤”）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有交情，乃慨然答应设法善后。结果，江孔殷疏通了有关方面，并电知广仁善堂

说明此事，他本人可负全责。于是，潘达微得善堂允许共商善后事宜。”于是，在黄花岗烈士墓的《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》中就记述了潘达微殓葬烈士遗骸的事实：“……党人潘达微奔走了某地营葬得善堂赠地一片曰黄花岗……尸得七十二具件工百余人络绎于道竟日始毕。”

所以，应该承认：江孔殷在这件事上，在关键的时刻是出了力的，是有功劳的。

三

江孔殷在督办任内兼办广东省慈善会，以恤抚救济贫民为主。至抗日战争前，他仍以个人名义捐医赠药。江孔殷离开仕途之后，思想开明，保持气节，有两件事是值得记的。

一是江孔殷和孙中山先生的交往。

江孔殷是个有影响的士绅，对协助收殓七十二烈士的遗骸是有功劳的。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，孙中山先生对江孔殷甚为推崇。为表示对江的敬重，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、廖仲恺、何香凝等，还曾亲自登门拜访，在江太史第的花园内合摄留念。据江孔殷的孙儿回忆：祖父江孔殷，当时住在广州江太史第。当时孙中山先生、宋庆龄夫人、廖仲恺先生、何香凝夫人都来过他们家，并在太史第的花园内摄影留念。可惜照片在土改时被毁了。他们还回忆起，何香凝到他们家画兰花时，他们还给她铺过宣纸并曾与当时年纪小小的廖承志玩耍。……后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政府，江孔殷